

评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的西方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①

陈学明

摘要:本文介绍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中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英美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虽仍有一部分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对它的当代意义进行阐释,但随着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影响的日益扩大,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那种否定性、批判性研究的倾向逐渐占据上风,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

20 世纪 80、90 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易帜,对西方左翼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原先西方的共产党,就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他左翼力量,也都程度不等地遭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20 世纪 90 年代初,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度陷于“沉寂”。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

① 本文是《20 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一书的第四编的“编首语”,写作本文时参考和吸收了参与该书编写的相关作者的相关成果。

的拥护者、同情者,还是反对者、诋毁者,可能都未曾想到,这种“沉寂”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自 90 年代中期起,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法、英、德、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事实已很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一些西方政要和右翼学者所宣称所希望的那样“行将销声匿迹”,而是“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且“活得很好”。即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也以一种空前的影响力在“复兴”。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在西方世界的主要城市接连不断地召开,一系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杂志的相继推出,则是这种“复兴”的主要标志。正是在这“复兴”的过程中,原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又获得了新的发展,甚至还涌现了一些新的派别。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缓,反而呈方兴未艾之势。特别是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爆发,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是被进一步引向了深入。

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的“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以前的那种研究。当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论是其研究的特点、主题、趋势,还是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都相异于从前。当然,我们不能把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整个 20 世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割裂开来,它们构成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指出,走向 21 世纪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把 20 世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

在西方世界原先的各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中,苏东剧变后发展

最快、影响最大的当属“生态马克思主义”。苏东剧变,并没有给“生态马克思主义”带来多少负面影响,相反,自20世纪的90年代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在理论建树方面,还是在实际作用方面,其发展势头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阶段。“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的飞速发展,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为扫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的各种疑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人甚至把“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的飞速发展视为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生的主要标志,把“生态马克思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苏东剧变后非但没有走下坡路相反还大步前进,这与它所探讨的主题密切相关。最近几十年,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地出现在人类面前,解决生态危机已成了人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生态问题作为研究主题,而且由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作为出发点,从而比其他任何生态主义派别都要具有吸引力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自然获得了飞速发展的有利条件。“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建树一方面在于,它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全面推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构想比起其在20世纪70、80年代所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要求,更为完整、成熟,完全改变了以前还或多或少接受生态运动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理想的局面。

美国《每月评论》杂志主编福斯特,是当代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揭示,以及以他所展示的马克思的生态理论为武器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福斯特坚持认为只有唯物主义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理论资源,他再三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这种生态观直接导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福斯特通过分析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土地论的批

判、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对鲁道夫·蒙特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对蒲鲁东“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判,来说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生态世界史观也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蕴。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生态世界观主要体现在他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之中。福斯特也正是通过剖析这些著作来揭示马克思的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生态世界观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劳动异化与自然异化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这构成了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一个出发点。福斯特强调,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一些核心理论实际上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形成,这就是:所有生态问题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城乡对立的解决乃是超越人类对自然异化的关键因素,而要消除城乡对立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研究集中于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新陈代谢”理论的研究,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新陈代谢”理论完整地论述了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以及解决途径。福斯特并不满足于通过对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研究,原则地说明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而且在此基础上还依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具体地阐述了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究竟是如何展开的,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如何按照其“内在逻辑”破坏生态环境这一点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当代美国另一位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主要从“历史与自然”、“资本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自然”这三个方面具体揭示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蕴,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从总的来说已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现在需要做的是将其完善和进一步发展,而不是撇开它另外建立一门什么生态科学,凡是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而另外再构建什么生态科学的努力,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义首先在于它为正确

地回答有关自然危机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在他看来,马克思论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关系所使用的方法既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伪科学的观点”,也相异于后现代主义的“混乱观点”,而且要比当今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流行的那些方法“更具全面性和实践性”。他通过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研究生态问题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其一,资本在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既把自然界当作“水龙头”又把自然界当作“污水池”;其二,工人在遭到经济剥削的同时,又蒙受生物学维度上的剥削;其三,资本主义积累既会面临内在的经济障碍,又会受阻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性障碍。奥康纳指出,人们只知道在马克思那里有对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的分析,实际上还有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分析,尽管后者与前者相比显得不是那么充分和系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理论不仅使人们看到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生产过剩的问题,更存在着生产不足的问题,即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着“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力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正从需求的角度冲击着资本,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则从成本的角度向资本发出挑战。他强调,马克思的学说的生态意蕴不仅表现于使我们能正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与在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体现在帮助我们真正把握社会主义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给自己赋予的使命是在阐述马克思的资本与生态矛盾的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从生态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奥康纳认为,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总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更为社会化形式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走向社会化,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实际上,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条件的“更为社会化的供应模式”的发展,即生产条件日益走向公共化和社会主义,也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佩珀指出,尽管不能认为存在着一个马

克思主义的生态流派,但无疑,马克思主义确实以一种虽然比较含蓄但颇具意义的方式包含了足够的生态学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由于劳动者和自然都受阶级统治的剥削,从而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自然都能随着从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而获取自由”,所以,他们必然有一个“明确的生态立场”。他提出,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在佩珀看来,在马克思那里,生态矛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第二大矛盾,它与资本主义的第一大矛盾即经济矛盾一样都可以用马克思的“抽象劳动理论”来解释。按照马克思基于“抽象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需要不断扩大市场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过度生产”,而“过度生产”一方面破坏了其自身的市场,另一方面则直接损害了生态环境。佩珀研究了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环境的论述,认为这一理论告诉我们为什么资本主义“内在地对环境不友好”。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追求不断增长的动力机制,资本主义要为满足日益扩展的市场提供足够多的商品,这种扩展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消费不加以扩展的话,资本主义企业在竞争中就无法生存与立足,而随着消费的扩展,对资源的使用也必然日益增长。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与环境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增加资本积累”这一铁的规律,当然,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使利润日益增长、资本不断扩大是必要的,但对于自然和环境来说,将必然是灾难。佩珀指出,当今许多人都在做关于“绿色资本主义的梦”,而马克思主义对自然与环境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的研究,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本外在化”的研究,表明这只能是一种“梦呓”而已,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可能成为“绿色资本主义”的。

美国的另一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柏格特的主旨在于重构马克思的自然、社会和环境危机等方面思想的内在关联。在柏格特看来,马克思对商品价值和资本的讨论,从理论上揭露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和把自然还原为资本积累的条件这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揭示了工人阶级斗争和大众环境斗争之间具有根本性的“亲缘关系”。因而,这是一

个具有重要政治实践意义的社会生态学的阶级分析模式。柏格特把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不仅作为他的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作为研究重点。他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自然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柏格特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科学在研究人类资本主义生产时,应该突出的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剥离而不是二者的同一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如一些生态思想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在欢呼人类控制自然的胜利。柏格特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中包含有一个环境危机理论,并且马克思考察了由资本主义导致的两类环境危机:其一,资本积累危机,这类危机源于资本生产的物质需求与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原料生产规律之间的不平衡;其二,人类社会发展的质的方面更一般性的危机,这类危机源于物质和生命力量的循环出现了紊乱,这种紊乱主要是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工业分工造成的。后一类危机主要着眼于作为人类发展之条件的自然的被剥蚀。柏格特强调指出,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危机中的内在部分,而这一切都是由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决定的,即为利润而生产与为人类需要而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危机则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发展到顶峰时的表现和状态。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把自然理解为有无限的资源可资利用,并且主张人控制自然的反生态的伦理观。柏格特认为,马克思不可能把人的未来发展观简单地归结为扩展和完善资本主义的已高度发达的反生态的技术去实现自由时间和大众消费的增长。事实上,马克思展望了一个质上丰富的“人—自然”关系和“人—人”的关系的图景,这个图景是亲生态的。

二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苏东剧变后在西方世界另一个发展比较迅速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它的飞速发展同样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

今世界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西方“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明显受到文化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具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它成了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西方世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复活”,正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强劲发展的背景下实现的,因此这种“复活”不能不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不能不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印记。“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英语系教授享尼西,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享尼西看来,要充分理解女性主义关于如何理解妇女生活的物质性的争论,必须关注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因为它是当今西方学院派女性主义的主流话语。享尼西提出,在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与挑战相伴随:一方面女性主义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妇女受剥削与压迫的社会结构分析;另一方面又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提出挑战,形成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不同名称,这些名称表明它们不同的强调重点或使用了不同的概念,但所有这些概念都表明女性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享尼西尽管也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她不赞同后现代主义拒绝对社会进行总体的、系统分析的观点,而主张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必须既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体进行批判,因为妇女的生活时刻受世界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影响,又强调考察妇女之间的差异。享尼西吸收了福柯、拉克劳、墨菲等人的思想。在她看来,福柯与拉克劳、墨菲的两种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关于社会分析的方式对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阐释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关于主体和语言理解的立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拓展了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努力。在亨尼西看来,新妇女新历史具有以下内容:第一,妇女的历史,并不是要用妇女主体的编年史代替男性主体的编年史,而是把冲突、歧义、悲剧恢复为历史过程的中心,把“妇女”作为新领导秩序中的关键人物;第二,女性主义理论的关注点从“性别”转向差异,女性主义历史把差异当作历史过程的中心;第三,把历史阅读为意识形态,历史作为一种文化叙述总是对现实的干预;第四,明确女性主义历史与女性主义理论、身份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阅读新妇女历史。

当代“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英国肯特大学卢瑟福学院英语文学系教授兰德里和英国约克大学英语文学系教授麦克林,合著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著作,就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内容与特征,以及对女性主义政治与学术研究之意义展开了详尽的论述。兰德里与麦克林在追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对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与概括,同时也对自80、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她们高度赞赏一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政治相遇。兰德里与麦克林提出了反对“女性主义的商品化”的问题。她们认为,“女性主义的制度化”与“女性主义的商品化”密切相关,简单地反对“女性主义的商品化”是没有用的,文化发展的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使包括妇女在内的一切商品化了。兰德里与麦克林根据马克思的商品理论指出了“女性主义的商品化”在于其均质化与统一性。在她们看来,“女性主义的商品化”表现在很多方面,把女性主义或妇女研究作为学术领域中的一个领域、一种畅销理论或学术观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兰德里与麦克林认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使得唯物主义能够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更相容,因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影响下产生的研究女性问题的方法或思潮。在她们看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优点就在于强调了话语、意识形态的物质

性,接受了“解构”的观点等这些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立场。兰德里和麦克林揭示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之间的主要区别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坚持以阶级矛盾和阶级分析为中心,并尝试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展开对性别压迫的分析;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除了阶级矛盾之外,还有性别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还有浸透于包括种族、性行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的各种矛盾。

苏东剧变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在她们所推出的众多的评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中,1996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一书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该书由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凯瑟琳·吉布森与朱莉—格雷汉姆两位“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合作撰写而成,以 J. K. 吉布森—格雷汉姆为署名作者出版。在这位“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当今包括一些左翼思想家在内的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判都是不得要领的,而为了实现改变这种局面,改变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她们自己认为所使用的方法“吸收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策略”,实际上他们主要使用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多元决定论的方法。她们把全球化比喻为“男人对女人的强奸”,即资本主义或它的代理者跨国公司这一“男性”,对并非完全资本主义的经济或领域这一“女性”的强奸。她们认为,按照这一比喻,全球化的过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作为被强奸方的资本主义的“另类”是无法抗拒这一过程的,而只能把资本主义全球化当作一种事实接受下来,把通过资本流动形式推进的全球化当作是对国家和地区的帮助接受下来。只要把全球化语言与强奸语言作一比较,就不难认清全球化的本质,因为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许多明显的联系。她们提出作为被强奸方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不一定是弱者。她们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论点,而这两个论点才真正是她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独特的分析:其一,受害者不一

定就是弱者,受害者有着自己的优势,从而可以做出相应的反抗,也就是说,只要非资本主义经济方不把自己定格于“弱者”的角色,那资本主义经济方的虚弱本质也会显示出来;其二,受害者不一定就是被动者,受害者可以主动地对受害的过程进行调控,一方面把受害的程度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把受害转化为受益,这就是说,实施资本主义全球化对非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意味着灾难和死亡,但只要后者握有主动权,其最终结果未必如此。她们企图构建“新的两性关系范本”。在传统的强奸范本中,女性作为受害者的主体地位之所以建立起来,不只是因为强奸者的力量和强暴,而且是因为强奸范本在它形成过程中所利用的关于女性性认同的学说,即把女性确认为是“需要渗透和安慰的黑暗世界”。从而,她们要推倒这一强奸范本,即要对男性性认同的学说发出挑战。由此出发,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机体的虚弱性做出了尖锐的抨击。在他们看来,揭露了作为强奸主体的男性和全球化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虚弱性以后,一种替代传统的强奸范本和全球化范本的新的范本的轮廓就大致形成了。构成这种新的范本的大致轮廓是强调行为的双方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不仅仅强调男性对女性的渗透,资本主义经济对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而且强调女性对男性的作用,非资本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非常清楚,他们所要提出的新的全球化范本就是强调全球化不仅仅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且为多样化的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

探讨 20 世纪后半叶,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广为流传,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认同和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遭到了空前的扭曲与损害。“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早在 1950 年代就已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经过十余年的孕育,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终于形成了一股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立场试图在作为政治与文化力量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祛魅中拯救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仍有价值的一些方面。它的理论先驱一开始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随着 1968 年“五月风暴”的结束和西方七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出现,部分新左派理论家开始以多种方式解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并对意识形态的自主性进行立论和论证,这一趋向和后现代思想的一些成果的嫁接使后马克思主义以积极的理论建构姿态呈现。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它内含许多派别,我们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所探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都可以归入“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些流派和代表人物成分复杂、政治态度各异、观点纷繁,但至少都具有下述共同特点:对资本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具有与后现代主义相一致的批判精神;信奉后现代主义者的“解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等;强调话语世界,把一切视为语言的符号系统;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从哲学渊源上看,这些流派和代表人物都以批判解释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主要依托。从狭义看,“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英国新左派理论家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在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后继性使用以及概念化阐释过程中,英国新左派理论家拉克劳与莫菲的著述最引人注目,他们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左翼、右翼及中间阵营中均激起了持续不断的理论争鸣和探讨热潮;其影响的领域广泛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美学、经济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拉克劳与莫菲被公认为西方世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最典型的代表。

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通过对结构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分析着力阐述了一种意识形态“接合理论”——正是这一接合理论为拉克劳带来了最初的学术名声,并确立其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作为欧洲新左派理论家的地位。拉克劳的接合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某一历史性意识形态包含着异质的多种原素,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原素并不一定都必然地具有阶级属性,其中有些原素根本是非阶级性的、中立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不是由主体在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地位所预先规定的,它取决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原素之间的联结方式,这种赋予意识形态以统一性的联结方式就是拉克劳所指称的“接合”。把这一理论运用到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的分析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原素在相互作用中建构起来的——某种中性的意识形态因素最终被接合进何种阶级话语之中完全取决于“霸权斗争”。显然,这一接合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完成了一次“逆转”:社会力量或团体并非由客观的经济条件建构其统一性,然后才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而实际情形则正好相反。

拉克劳与莫菲自认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实现了“哥白尼式革命”,而他们说到的“哥白尼式革命”涉及到对既定关系的颠覆:在康德那里,认识主体并不是客体的反映,相反,认识的客体倒是主体建构的结果,因为,知识可能的条件也就是认识对象可能的条件;而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不是“经济的最终决定”赋予主体的优先地位抑或是什么“历史规律的担保”决定了此一主体的霸权,相反,是霸权接合实践活动本身建构了主体的霸权身份,因为,霸权可能的条件也就是历史性的政治主体可能的条件。即使仍然谈论“阶级”,也不是“阶级”决定“霸权”,而是“霸权”决定“阶级”,一如他们所言,霸权概念比阶级更具基础性,因为,阶级的位置性在政治主体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存在于社会既定历史时刻的霸权类型。对霸权的这种阐述当然“超越了葛兰西”,正因为这一“超越”,葛兰西一下子从一个反还原论的斗士变成了还原论的残余分子。其实,葛兰西并没有变,他始终是那个葛兰西,

真正改变的倒是拉克劳与莫菲自己。

援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洞见,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度解构,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根本性的建构,这是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1985)一书中所要成就的事业。在解构的维度上,拉克劳与莫菲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一消解,悉数抛进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垃圾箱。而在建构的维度上,拉克劳与莫菲引入了独特的话语理论、阐发一种新颖的对抗观念、论述了霸权性的政治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规划。至此,他们如果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范畴和基本命题弃置一边之后却仍坚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则既不称己意又难以自圆其说,那么,他们就干脆取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后(post)”字之意,以此一“后(post)”置于“马克思主义(Marxism)”之前,成就一种奇特的叫作“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东西。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外乎是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简称和缩写,换言之,这种“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带“后”字头的马克思主义,即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施以“后化(Posting)”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与莫菲从来没有妄言自己那里还有很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但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业已把传统马克思主义清除得一干二净,更不承认他们除了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为“重建一种特别类型的解放规划”付出真正有所成就的实实在在的努力。他们所说的作出的努力之一就是建立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他们的话语理论的基本预设是:所有对象与行为都是有意义的,而意义是由特定的规则体系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用拉克劳与莫菲的措辞来表达就是:意义乃是“接合”的产物——之所是接合,是因为任何意义都具有关系性特征,即便是单个的语词,其本身也无非是能指和所指“合成”的关系性结构。接合就是把诸多原素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暂时的意义统一体

的过程——接合既是差异性的连接,又是新认同的缔造,换言之,在对差异性原素进行连接的过程中,原素原先的“身份”不知不觉中被篡改了,而新的认同恰恰就建基于这种篡改之中。拉克劳与莫菲在对话语概念进行界定之前,先以“社会形态与多元决定”为题,对阿尔都塞主义以及赫斯特、辛德斯等人对阿尔都塞的批判展开了批判,这一“双重批判”的宗旨在于既抛弃“总体的本质主义”同时又避免陷入“原素的本质主义”。

拉克劳与莫菲为“重建一种特别类型的解放规划”所作出的另一方面的努力是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概念。他们提出,哪里有认同,哪里就有对抗;对抗伴随着主体认同的始末。对抗的“不可排除性”宛如矛盾的“普遍性”,然而,对抗不同于矛盾,“矛盾也不必然意味着对抗关系”。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他们借科莱蒂之口引出康德关于“现实对立”与“逻辑矛盾”的区分以说明矛盾并不存在于一切领域之中——矛盾出现于命题领域,而对立则出现于现实的对象领域。然后,他们又说,对立只能描述现实的对象领域中已完成的对象性关系,而在现实领域中,还有大量未完成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独特的关系只能用“对抗”来命名。对抗既不同于矛盾也不同于对立:对立表示两个现实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矛盾表示两个概念化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而对抗表示的是两个没有最终定型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拉克劳与莫菲的对抗理论主要是想要说明这一点:对抗并不必然在单一点上发生,也不必然源于某一内在关系,而是由外在的否定所构成,易言之,主体认同并不是由必然性逻辑所规定的,而在建立在外在的、偶然性的关系中。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并不必然发生在生产场所,并且它也不是生产关系内在所固有的,而是建立在生产关系与外在于它的主体认同之间。对抗的外在构成必然导致反抗的共识不可能在种种反抗的内在性中去寻求。必须从限制之外(即界限之外)理解限制本身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或者说,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总体必须是在“特殊性本身的内在逻辑之外运行的一种接合”。

拉克劳与莫菲为“重建一种特别类型的解放规划”所作出的还有一方面的努力则是建构了“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理论。他们所说的“霸权”是与“普遍性”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每一种普遍性都是一个战场,谁来填充这一空位,谁将是这一空位的“霸主”。作为空的能指的普遍性与作为普遍性之替身的特殊性必然导出“霸权”概念。霸权是一个“转喻”:就像不同国家之间为了谋求霸主地位而大动干戈一样,相异的特殊性为了普遍性的“名分”而你争我夺。“霸权”总是意味着“占有”本来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它多少带有超出应有的权力界线、向外部延展势力、扩展控制范围之意。他们强调,确立霸权,就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建构一种特别的普遍性。普遍性的建构不是通过肯定的方式而是通过否定的方式,并且,这种否定不是可以纳入理性调节体系中的纯粹否定性。正是这种构造方式的特别性成就了特别的普遍性形态:不是差异性原素本身具有共同的肯定性内容成为共同体的聚合剂,而是由于这些彼此没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原素遭受到了共同的否定(或排斥)才形成了一种否定性认同。拉克劳与莫菲挪用后现代主义的资源对来自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霸权”概念进行了重构,“霸权”俨然就是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名词。从多元决定、接合、话语到主体认同、对抗、等同与差异、普遍与特殊再到错位、空的能指、异质性,这一系列关键词被用来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层面来描述、界说同一个“霸权”概念。通过这么一种新型的“概念工具”的锻造,拉克劳与莫菲不仅展示了一种富有创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视野,而且积极地将这种视野引向民主的革命性建构。拉克劳与莫菲致力于探寻一条把霸权与民主结合起来的道路。在对霸权的概念化阐释中,拉克劳与莫菲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拉克劳与莫菲的所说的“霸权”就是一种“民主形式的主导权”。

四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发展阶段,法兰克福学派始终都是“主角”。在苏东剧变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也是如此。苏东剧变并没有使法兰克福学派沉寂,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认真反思苏东剧变留给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继承地推进他们的研究。比较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派别来,法兰克福学派在苏东剧变后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修正的程度是最大的。但这种“修正”并不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当然也并不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派别。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是以批判理论闻名于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从哲学、社会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等视阈,对西方文化传统和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发出了任何现代化国家都感到震惊的呐喊。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起,法兰克福学派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即主要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研究和批判,这使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第三个发展阶段”。如果说,后期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与协商政治理论,开启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那么,维尔默的政治伦理学构想、奥菲的福利国家理论,则进一步推进了这个转向;但是,只有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多元正义构想,才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最终完成。这里着重分析霍耐特、维尔默、奥菲对批判理论最新发展的贡献,在此基础上简要介绍一下哈贝马斯的最新研究。

霍耐特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现任所长,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核心人物,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的关键人物。他主要提出了承认理论及多元正义构想。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为承认而斗

争》和《正义的他者》这两部著作中。如果说,《为承认而斗争》揭示了承认理论的规范发展目标;那么,《正义的他者》则旨在揭示程序主义正义理论的局限性。在《正义的他者》中,霍耐特不仅阐述了自由、民主、人权、共同体等政治哲学问题,而且阐述了道德关怀、正义与情感纽带、承认道德等道德哲学问题。为了论证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必要性,霍耐特走出了重要的四步:一是对社会哲学的两条路径,即历史哲学路径与人类学路径进行了梳理,这就为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准备了理论背景;二是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这就为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提供了理论前提;三是对福柯权力理论进行了诠释与重构,从而使早期批判理论困境得到了“系统理论解决”;四是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这不仅使早期批判理论得到了“交往理论转换”,而且论证了从交往范式的语言理论转向承认理论的必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就是承认关系结构理论。在承认关系结构中,承认与蔑视关系、蔑视与反抗关系居于核心地位。在这里,霍耐特试图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相互承认关系三分法的经验依据在哪里?二是相互承认关系的不同形式是否是人类实践自我关系的不同阶段?三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为承认而斗争”动力的社会体验是什么?如果说,承认理论是霍耐特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多元正义构想与政治伦理学就是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的进一步拓展。霍耐特断言,承认理论的多元正义构想不仅能够关涉道德进步的法律承认那里接受批判的任务,而且总是需要对不同承认领域之间的固定界限进行反思性检验。所以,在观察社会发展时人们至少应该谈到道德进步,而且应该使政治伦理学以承认原则为取向。这样,由爱、法权、成就三个基本领域共同确定的东西,今天就应该被置于社会正义观念下理解。

维尔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的过渡性人物,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与第三期发展之间的中介人物。他试图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构建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并阐发现代—后现代美学、

“自由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和民主伦理学构想。维尔默为了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首先,他重释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提出,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意义上,马克思并未真正解决而只是消解了黑格尔的现代自由制度问题,而韦伯的现代合理化理论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历史哲学,对于韦伯无法解决的“合理化悖论”,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试图借助启蒙辩证法来解决,并“试图将韦伯的某些洞见整合进被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其次,他重释《启蒙辩证法》,他认为,《启蒙辩证法》“最终成为阴郁的现代性理论”,因为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启蒙的本质是二难选择,最终必然是统治,不可阻挡的进步的厄运是不可阻挡的倒退;最后,他重释哈贝马斯,在他看来,哈贝马斯的成就就是在批判理论内部做了概念修正,这种修正有可能避免马克思和批判理论的理论困境。但是,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并没有为真理共识论提供证据。他强调,合理性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活生生的“理性文化”,这才是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维尔默在他的现代—后现代美学中提出:艺术美作为对自然美的模仿,就成为一种从沉默中解放出来的、获得了救赎的、能够说话的自然图景,就像成为和解的人的图景一样;艺术真实是仅仅表现为特殊真实的真实,作为特殊的东西,艺术真实总是依赖于未被歪曲的现实;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艺术,不可避免地处于“美”这个概念的彼岸;承认艺术本身不可能是乌托邦视阈的载体,是正确的。维尔默在他的“自由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中明确指出,新个体主义的自由概念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而新共同体主义的自由概念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在他看来,话语合理性条件不能等同于民主话语条件,个体权利不能从合理性原则中引出来。自由民主原则和制度只能在生活中获得。在人权概念与公民权概念之间,不仅存在着不能否定的内在关联,而且也存在着特有的张力关系。公民权与民主话语之间必然存在解释学循环:即人权承认不仅是政治自由、民主话语的前提,而且是政治自由、民主话语的结果。

奥菲是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他继承了法兰克福

学派批判理论传统,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同社会学的功能理论、系统论理论紧密结合,对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矛盾进行了系统研究。奥菲以独特的、系统化的方法来研究国家政策。他将与国家理论相关的问题分为八个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化;商品形式的瘫痪;交换机会最大化;行政性再商品化;国家政策手段;后期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奥菲考察了福利国家的矛盾,他认为,福利国家的矛盾就是:晚期资本主义体系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尽管它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是破坏性的,然而废除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将更是毁灭性的。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一系列无法逆转的结果,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重回某种类似于纯粹市场的社会。尽管福利国家的设计旨在“治愈”资本主义积累所产生的各种病症,但疾病的性质也迫使病人不能再使用这种“疗程”,生产剥削关系与抵制、逃避和缓和剥削的可能性同时并存。奥菲对于福利国家矛盾的分析既来自于对马克思的深刻洞察,如对内在于劳动商品化的不平等权利的指出;也来自于哈贝马斯的对公共领域的界定、合法性危机的阐述。奥菲得出的结论是,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交流过程既占支配地位,又“不断隐退”。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的问题就是:防止行政权力的管理过程变成对私有交换关系的自主性控制,或是使其瘫痪,或是以革命的方式将其推翻。资本主义经济越是被迫运用“外在调节机制”,它就越是面临防止这些侵略性机制的内在动力以维持自身生存的难题。在对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分析中,奥菲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新的思考。奥菲认为福利国家是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系统的矛盾而产生的,旨在是通过国家的干预和管理手段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作。但是福利国家不仅无法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还带来了更多的问题、矛盾和危机。于是,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潮,试图重新返回到不要任何国家干预和管理的市场社会中去。奥菲认为以新自由主义方案来替代福利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为此,他提出了替代资本主

义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方案,当然它只能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那种前苏联式的官僚化的社会主义,即不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

哈贝马斯在苏东剧变后仍然非常活跃。虽然他不再负责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但他的理论活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期发展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自从哈贝马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了以“交往合理性”取代“理性”概念之后,就不时出现一些怀疑和反对的声音。在新的历史时期,哈贝马斯给自己确立的任务是: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从道德哲学、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等方面,重新探寻理性的实现之路。如果说现代化过程表现为理性化,但其结果却主要是目的一工具理性的实现,那么哈贝马斯则试图通过重建道德哲学、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探索一条交往合理性实现之路。哈贝马斯试图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商谈伦理学。在他看来,建立商谈伦理学的关键在于确立普遍性的原则。对这一原则,哈贝马斯作了区别于经验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解释:首先,在“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中发挥作用的,是每个参与者的实用理由和伦理理由;其次,相互接受视角,要求的不是移情,而是通过解释介入到参与者的自我理解 and 世界理解当中;最后,“共同自愿接受”这一目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内容:参与者提出的一切理由都必须彻底消除掉与行为动机相关的意义,并在对等尊重的前提下具有一种认知意义。哈贝马斯1992年出版的法哲学巨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提出的是一种“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哈贝马斯在这部著作中把法律和民主定位于“事实与规范之间”。他认为,良好的法律总是介于事实和规范之间的,就是说,它既具有由暴力支持的意志的特征,又具有理性特征。但是,真正形成良好的法律并非易事,它需要在不同的人们之间展开对话。商谈理论强调对话。对话就必须满足一定的有效性要求,这些有效性要求凝固为固定的程序。具体到法哲学中,哈贝马斯认为必须从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运用交往行为理论对其程序进行重构。哈贝马斯提出

了“世界公民社会”的设想。世界公民社会,按其本义来说,是指全世界的人民都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统治之下生活。哈贝马斯承认,目前“统一的世界政府”仍然只是一个空想,因此他所说的世界公民社会是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公民社会”。哈贝马斯的“世界公民”概念,显然是来自康德。哈贝马斯一方面重申了康德关于世界公民社会的思想,另一方面对这些设想做了改进。哈贝马斯在这一历史时期一方面从其交往行为理论出发,从道德哲学到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再到国际关系理论,力图为如何构建一个新的社会提出自己的方案和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则并没有放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了在一定意义上比以前更激烈的抨击。正是这一“破”一“立”构成了他晚年思想的特点。

五

对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历来把重心放在欧洲大陆而忽视英美。确实,这样做有一定的缘由,因为长期以来,比起欧洲大陆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要逊色得多,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出自欧洲大陆而不是英美。但是,倘若时至今日还这样做,就不合时宜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以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空前活跃。在当今的英国和美国,活跃着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家,英国有安东尼·吉登斯、佩里·安德森、特里·伊格尔顿、恩内斯托·拉克劳,查特尔·墨菲,美国有诺曼·乔姆斯基、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大卫·哈维、朱迪·巴特勒、迈克·哈特、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等等。可以说,无论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哪一个学术领域,英美马克思主义都在主导和引领着学术话语权;今天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大多都属于英美马克思主义。从一定意义上,我们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苏东剧变后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出现了复兴,主要是

指在英国和美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局面。与传统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英美马克思主义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气质和学术旨趣:英美马克思主义是在后现代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它的思想致思中始终隐现着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内蕴;英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谱系上大多承袭了后结构主义的传统,因此,后结构主义的风格构成了英美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风景;英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大多遭遇或目睹了极权社会主义的幻灭以及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恶性膨胀,因此,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上,英美马克思主义大多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以实现新的理想社会,从而,激进民主成为了英美马克思主义思考的重心。鉴于本书的其他章节已对一些在当今英美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作过评述,这里仅述介若干位其他章节未涉及的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终身教授穆泽利斯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试图将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引入到社会学、政治学上去,提出理论化实用主义的方法来重新诠释社会的形成、构造和转变,为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维度上的拓展开辟了新的视野,也为我们了解后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思想踪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穆泽利斯的核心工作是要克服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经济还原论,也就是说,如何摆脱用经济的观点和范畴将政治或意识形态概念化,同时尝试自己对社会构成的解释,这种努力就是他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抉择。虽然穆泽利斯把自己的尝试叫做“后马克思主义”,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当然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但应当与拉克劳和墨菲等人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穆泽利斯不仅不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拒绝,反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价值贡献,比如整体论与辩证法就是它最富价值成效的两个方面。然而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经济还原论特征却抵消了它的价值,因此克服还原论自然成了穆泽利斯运思的中心。穆泽利斯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中所隐含的经济还原论的揭示,而在于对各种各样的还原

论类型的具体析分。这种细致的区分打破了人们通常对马克思主义还原论的笼统批评。他具体分析批判了两类四种还原论类型：第一类是还原论的唯意志主义类型，它包括行为者→行为者（ $A \rightarrow A$ ）的还原论和行为者→结构（ $A \rightarrow S$ ）的还原论两种；第二类是还原论的结构主义类型，它包括结构→结构（ $S \rightarrow S$ ）的还原论和结构→行为者（ $S \rightarrow A$ ）的还原论两种。他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还原论的共同特点是从经济基础的结构和功能中得出文化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形式和实际，从而忽略了政治和文化现象的相对独立和特殊性。穆泽利斯在析分还原论的类型及特征之后明白，简单地宣称和论证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并不能摆脱社会秩序建构上的经济还原论。要克服经济还原论必须尝试制造新的概念工具，这才是使政治学、社会学等等走上独立性道路的不二法门，也是穆泽利斯自己“后马克思主义”的致思重心。他认为，如果马克思的整体论逻辑能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工具可以被提高，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法论缺点可以被改正。穆泽利斯认为自己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方法论和启发的意义上是彻底实用主义的，他称之为“理论化的实用主义”。穆泽利斯的“理论化的实用主义”首先致力于建立起一种非还原论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框架，然后将这套概念框架用来处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将它应用在对单个情形的经验分析中，通过展示这一概念框架处理具体社会历史发展的效用来验证超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和经济还原论的可能。

伊格尔顿是当今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判家。尽管伊格尔顿的思想显得非常杂芜，但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主题，即致力于揭示话语与权力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这一主题是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始终坚持的主题，只不过伊格尔顿在他们的基础上做了引申与推进。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刻意去掩盖知识与权力的勾连，而伊格尔顿就是要彻底暴露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这就是伊格尔顿思想的独特性和价值性所在。通过对文本的互读，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目的在

于揭示出文本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而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直指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这显然延续了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思路,尽管伊格尔顿在很多地方对后结构主义颇有微词。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的立场与齐泽克等人相近,而与主张超越意识形态的其他英国思想家如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有别。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关注,是为了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抹除意识形态做法的自觉抵制。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不可被解构,也不可能被解构,对意识形态解构的态度貌似激进,实质是对现实矛盾的刻意回避,就好像鸵鸟把脑袋埋在沙堆里以躲避灾难是同样的道理。相反,我们应当正视意识形态问题,同时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意识形态的恒在性。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坚持这样的观点:第一,从意识形态的产生来源来看,意识形态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它受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第二,从意识形态的功能上来看,意识形态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及其利益的合法化。第三,从意识形态的惯用的手段来看,它一般通过普遍化、自然化甚至神秘化等手段来实现统治权力的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虚假意识。伊格尔顿强调,不通过现实的物质变革而指望通过观念的变革来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正是在这些关键点上,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走得很近,因此,我们把伊格尔顿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家是名副其实的。尽管总体上讲,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从来不认为意识形态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但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思想上又有自己的创见,这表现在他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话语。伊格尔顿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话语现象或一种符号学现象,实质上是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因为它把符号看作是物质实体,同时也保留了意识形态从本质上只关注意义这一意蕴。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话语性的强调,始终看到了意识形态观念背后统治阶级用形形色色的话语策略、话语手段扭曲事实真相的种种企图,从而时时刻刻提醒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角角落落,到处都

弥漫着权力统治的硝烟。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奥尔曼主要致力于政治理论的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他是美国著名的激进左翼人士,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却持激烈批评的态度。奥尔曼反对市场社会主义。他认为有些东西可以混合在一起,比如盐与辣椒,但有一些东西根本无法混合,比如水与火。而在他看来,市场与社会主义就好比水与火的关系。奥尔曼指出,市场这一绞肉机绝不会按照我们给它规定的路线走,相反,我们是根据它的节奏在运动,最终它把我们变成碎肉。奥尔曼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存在许多亟待研究的问题:一是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奥尔曼指出,马克思曾经想系统地去研究国家理论,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但由于其他事务的干扰,使得马克思没有精力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另一个是与共产主义的未来有关的问题。奥尔曼认为,在共产主义未来的问题上,马克思同样没有给我们具体描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会是一副什么模样;第三个问题阶级利益问题,以及阶级利益在阶级意识的发展和人们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尽管这一问题很重要,但马克思对这一话题同样谈得很少;第四个问题是辩证法的问题。奥尔曼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所具有的缺陷,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对辩证法的忽略和误用”。正如奥尔曼自己坦言,他的主要工作在于探讨马克思辩证法。在很多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更多看成是一种世界观,即回答“世界怎么样”的时候,奥尔曼则把辩证法更多看成是马克思的方法论。然而,这种方法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正题—反题—合题的综合体,也不是可以用来解释和预测一切的万能公式,更不是充当历史发展动力的东西。在奥尔曼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关注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和相互作用。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不仅阐明了马克思的真实意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化的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有效版本,而且他通过展示马克思的方法论步骤,目的是想让读者在掌握马克思的辩证法之后,能够将辩证法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

美国政治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哈特,是西方激进左翼人士,他的思想可以用激进民主来概括。同样是论述民主,但哈特的民主思想与哈贝马斯的民主思想有着天壤之别,哈特的民主思想从属于由卢梭所开创并由马克思等人所推进的激进民主传统,而哈贝马斯的民主思想从属于洛克所开创的协商民主传统。激进民主反对一切特权阶级和专制政府,主张人民的自治,而且也相信人民有自我管理的能力,认为实现了人民自治的社会才是真正民主的社会。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大众》和《共同体》三部曲则向我们揭示了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受控状况,这种受控也许是史无前例的。在大多数人对全球化运动歌之颂之,以为全球化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时候,哈特和奈格里则认为,全球化现象预示着一种新的统治形式的逼近。正是哈特和奈格里这种对时代问题诊断上的敏锐性,使得《帝国》一出来的时候就在进步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热议。通常我们认为美国的霸权统治是一种帝国主义统治,但哈特和奈格里则不这样看。美国的霸权统治貌似一种类似罗马帝国的统治,其实远不是这样。美国的霸权统治只是帝国统治的象征,它表明帝国统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种帝国统治以美国的“君主式政治”为先锋、以其他主要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机构等“全球贵族政治”为后援,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统治为维,将帝国的弥天大网依次撒向全球。这也就意味着,控制、压迫、奴役、监督这张弥天大网撒在了每个人的头上。所以,哈特和奈格里强调,在帝国的统治的态势下,“民主的可能性晦暗不明”,“民主的现代梦似乎确实丢失了”。在否定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他们对新“帝国”,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展开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批判:其一,通过对“主权”转变的分析展开的批判。他们指出,与全球化进程相伴,民族—国家的主权尽管仍然是有效的,但已不断地衰落。当然,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主权”已经衰落。实际情况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也就是说,“帝国”就是当前全球

新的主权形式;其二,通过对“生产”转变的分析展开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在“新帝国”时期的所有的经济活动,无论这种经济活动发生在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这种经济活动属于哪一个工业阶段,都受制于信息经济,也就是说,都受制于“新帝国”的占主导的经济范式。目前不同地域的那些不同的经济范式,不能仅仅视为处于不同工业发展阶段的可以共存的不同的经济范式,而应当视为是一些新的全球经济中不同的生产等级。正因为有着这种等级上的差异,所以被有效地排除在信息经济之外的那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尽管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工业生产,但“发现自己处在饥饿的边缘”。哈特和奈格里对未来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他们认为,既然全球化为帝国的出现制造了便利,那么全球化同样会孕育反帝国的因素。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全球化在制造压迫的同时也在制造反抗压迫的力量,反帝国的元素就在帝国内部生长起来。他们提出,反抗帝国的新革命主体已经形成,这就是“大众”。哈特和奈格里说大众是“从帝国中成长起来的鲜活的替代物”,这一力量也是实现激进民主社会的唯一有效载体。《共同体》是哈特和奈格里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这本著作中,他们将马克思的洞见与尼采、福柯、德勒兹、瓜塔里等人的洞见做了一个有效的结合。这本著作向生活在一个共同世界中的人们展示了新的管理共同财富的理想社会。

在当今英美马克思主义中,哈维的马克思主义新地理学独树一帜。虽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经典作家们对空间与地理问题给予了一定关注,但地理问题完全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探讨的重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等也重视空间与地理问题,但大抵受历史主义传统的强势影响,这种探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突出地位。不过,在列斐伏尔、尤其是哈维之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当今马克思主义中的显学。哈维是从实证主义地理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哈维把自己空间角度开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城市化是哈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基

本问题,哈维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在哈维看来,从理论上讲,城市恰恰是最能体现社会正义的地方,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最突出的矛盾也是社会正义问题。哈维的城市化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对城市性的定义、城市化的动因以及对城市化中的居住差异的论述,尤其具有创意。哈维通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与地理的分析揭示,破解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模式。哈维指出,与传统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发生了一些转移,但并没有根本区别。哈维不仅不承认所谓全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否定出现了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征兆。哈维讨论后现代状况的主题还是空间与地理问题。哈维从社会生活、社会力量资源、启蒙运动规划、现代主义文化力量以及后现代艺术等各个方面,展开对时空体验的描述,突显政治—经济与文化过程之间的联系,考察时间优先于空间进而造成时空分裂的历史,揭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不断突显的不平衡的地理发展问题。新世纪以来,哈维除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其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以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体系外,更多的表现为对人类历史及其解放问题的集中思考,表现为对新帝国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哈维提出了“新帝国主义”论。他认为,二战以来,帝国主义已向新帝国主义过渡,其特征是“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从属于“权力的领土逻辑”,“通过剥夺而呈现出来的不平衡的地理运动,恰恰是资本主义稳定性的必然结果”。

六

苏东剧变后,在西方世界引领马克思主义研究复兴的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正是这个学派组织了1995年9月27日至9月30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马克思大会”,这个会议引起了轰动,打响了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西方世界复兴的“第一炮”,也正是这个学派成功地举办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大会”,这

个会议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了高潮。这个学派所出版的《当今马克思》等杂志在国际具有广泛的影响。这个学派的出现是以《马克思主义批评辞典》的出版为标志的,该辞典收入 500 多条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条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该学派也因该辞典而得名。该学派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才。“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是继法国以阿尔都塞为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而兴起的派别,其成员大多是阿尔都塞同时代的学生、同学、同事或赞成者。上世纪 80 年代,法国曾经活跃一时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随着阿尔都塞因精神病退出理论界和萨特的去世而悄然离开人们的视线,“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就脱颖而出。“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人数众多,成分纷纭复杂,大致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人:第一部分人是比较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派;第二部分人是阿尔都塞派,其成员大多是原阿尔都塞学派的成员;第三部分人是“自由派”,他们宣称是“自由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表示不隶属哪一个党派和组织,自由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受任何约束。当然,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法国热衷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这些人。我们这里除了评述“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的思想之外,还重点研讨不属于该学派的鲍德里亚、巴迪欧的相关理论。而对“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中的有些代表人物,如巴里巴尔,在其他章节已作过介绍,我们在这里也不再重复。

拉比卡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主要开创者和领导人。拉比卡由于出身革命传统家庭,所以自青年时代开始,他就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且一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人生轨迹和思想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从此,他坚定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为改变世界而努力奔走一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就像公路的通行规则那样,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拉比卡也反对那种盲目服从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拉比卡认为,共产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像其他任何类型社会一样的社会;它只不过是争取民主而

进行的实际斗争,是充满斗争的创造性的实践。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拉比卡认为,苏联东欧剧变之后,资本主义虽然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胜利也使人们更加看清它的本质。拉比卡猛烈抨击资产阶级的虚假民主,他认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可以认为是民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反民主的制度。他把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称作“民主病”。他认为,“民主病”,它的出现,完全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是完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天天口喊“人权”,天天口喊“民主”,天天口喊“自由”的情况下出现的!他对意识形态做出了深入的研究。他研究了意识形态与阶级的关系,提出经济权力等于意识形态权力,还可加上政治权力。统治阶级的思想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统治者的物质关系的思想表述而已。意识形态是从阶级的统治中创造出来的思想,就是以统治阶级的眼睛作为自己的眼睛来证明统治的功绩。他批评列宁缺乏对统治思想斗争的总体考察,从而造成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变成了党性和党、科学和党的对立。拉比卡认为存在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其构成成分有科学和无产阶级。科学和无产阶级是分不开的,后者对于前者不是外在的关系。他提出无产阶级不是阶级,但它必将在战胜那种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固有的、意识形态上个人涣散的状态中成为阶级。这就是共产党人能够并应该帮助它的东西。阶级意识就是阶级觉悟。

戴克西埃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中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戴克西埃晚年一直与比岱在一起主编《当今马克思》杂志,长达24年之久。戴克西埃在法国是最早关注葛兰西思想和意大利共产党问题的学者。他指出,人们在理解霸权作用和司法命令作用的关系中,严重曲解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政治历史意义:如果霸权和专政的区分只有方法的意义而没有机能的意义,这就意味着霸权一承认只不过是一种社会生活总体操纵的方式。戴克西埃认为,葛兰西是唯一确定“市民社会”概念的人,他肯定葛兰西市民社会规定为“一个社会集团以国家伦理内容对整个社会实施政治和文化霸权”。他不赞同一些人所说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反民主的”，而赞同另外一些人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就是一种民主的思想”。但他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对民主问题既不是直接阐述的也不是孤立阐述的，而是与革命问题密切相关而阐发出来的。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包含着“不断革命”的思想，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思想主要是有两层意思：社会革命被理解为彻底的民主化以及与过去旧民主形式彻底决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戴克西埃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对“自然”概念的理解。第一方面涉及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问题以及决定论的认识价值问题；第二方面涉及的是在共产主义消灭一切自然性的意义问题。在他看来，马克思使用“自然”这个词是带有一定程度上的隐喻作用的，改变了的社会物质生活，在它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的两种形式下，而它的发展仍可称作“自然的”。他欣赏马克思所说的：历史运动本身是对“自然性”的否定。人的解放，剥削制度的废除，不管其形式如何都将是剥夺社会生活的自然的全部特性。共产主义的自由联合是对社会生活的非自然化。戴克西埃得出结论说，现代资本和金钱关系是废除前资本主义所形成的自然属性。就是说，它的特殊的生产方式大工业以及它的特殊的社会交往方式，自由竞争，把历史变为世界历史。然而并不是它消灭了所有的自然性，只有在现代资本创造的历史前提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才能消灭所有社会发展的自然性的这些特点。他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总是与它自己同一的自然史阶段。“史前史”的终结是人的非自然化。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自由联合超越了他们的必然，并让位于一种真正的个人交往，这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开始：有意识的合作的力量开始主宰世界。

比岱在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中属于“自由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曾任“世界马克思大会”主席，是当代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比岱全部理论工作的目标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行哲学探讨”，“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更具现实性的基础和更

加广阔的当代视野”。比岱的问题意识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当代危机”的理解。在比岱看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着来自其内部的两种威胁: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另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理论框架。这两种自我理解都隐藏着重重矛盾,而这些矛盾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当务之急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比岱自认为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工作就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比岱发现了《资本论》在叙述中出现的种种“叙述断裂”,对于比岱来说,《资本论》中最重要的断裂在于市场和资本的断裂。比岱围绕“元结构”问题提出一种具有“一般性”的(即不拘泥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理论。比岱将自己的新理论称为“元马克思主义”,他为这一理论规定的任务是,一方面继承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批判,另一方面弥补马克思在政治哲学方面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中的不足。根据比岱的“元结构”理论,市场和组织本来是相互包含的,但民族国家以组织化的超然形式将自身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成力量,从而掩盖了作为后者的真正的基础的“元结构”。比岱提出“元结构”理论后,感到有必要运用自己的这一理论重新解读《资本论》,以弥补《如何理解〈资本论〉》虽有开拓性但理论根基不稳的缺憾,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现代性理论。在比岱的对于《资本论》的“解读和重建”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工作体现在下述两个重建方向上:其一,从马克思所揭示的市场内在的矛盾走向“元结构”的展现;其二:从马克思所揭示的阶级结构出发走向资本主义话语批判。比岱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理论和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居主流地位的“新马克思主义”进行区分。比岱从当代阶级关系和社会斗争等角度讨论了他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他指出,他们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在“被组织的能力”中聚集起来的社会力量最终将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但“新马克思主义”还在那里强

调基础阶级在联合中的主导权。他们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从元结构理论出发认为现代世界从整体上说并不属于阶级性民族国家的模式,但“新马克思主义”这种“两条腿走路”的马克思主义,它建立在包括双极的统治阶级在内的双极性元结构的基础之上,认为资本主义总是以民族国家形式建立自身。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鲍德里亚无论是从其政治立场还是学术观点看,他不属于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甚至连这一学派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算不上,如果一定要对他加以“归属”的话,那把他列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列或许比较合适。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批评多于肯定,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他的影响不可忽视。他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除了他对消费主义做出了富有创意的研究之外,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独特的批评和修正。鲍德里亚关于消费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消费社会中主体所面对的是一个独立的具有自我叙述能力的物体世界,物体系主导了主体的需要、行为乃至无意识层面,从而对商品的崇拜进一步演化为对符号价值的崇拜。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到来不是人的主体性的解放,而是人的主体性的进一步沦丧,这是比马克思所面对的时代更加病人膏肓的人的精神状况和时代状况。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异化状况如此全面而且深刻,以至于任何超越和扬弃异化的企图都流于不可能,在个体既感知不到他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也感知不到除了消费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时代,超越性被终结了。鲍德里亚将消费作为一个社会整合的主动模式,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符号的积极操控”模式。鲍德里亚从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三个方面系统地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他提出以符码编码及其能指操控的方式为基础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已经代替了以商品—物品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他认为以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批判,相反它倒是一种在更深层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种;而在

哲学方面,他则根本否定人的物质需要所具有的自然必然性,以及人的物质需要本身的被动性也已经丧失了,因而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劳动及其解放所具有的对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解放功能也一并是一个幻象而已。鲍德里亚宣布马克思革命路径已经终结,在他看来,当马克思所预想的生产的总体性胜利失去了其中心原则之后,马克思的总体革命也就失去了意义。按照鲍德里亚对自己提出的理论任务,既然系统的总体逻辑从剥削的法则开始转向符码法则,那么这个社会必须从符码运行的逻辑来加以理解,革命路径也必须从符码反抗中寻求。于是,鲍德里亚提出了“象征交换”的概念以反抗资本主义的效用的和实利的价值观。对鲍德里亚来说,象征性交换活动就是不被资产阶级符号学或资本逻辑所决定的,具有潜在颠覆和反叛能力的活动。象征交换在鲍德里亚那里就呈现为他用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体系和实践方式的“革命”方案,同时也集中代表了鲍德里亚试图摆脱现代性原则所作出的一系列异质性的活动。鲍德里亚呼唤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系统外的符号反叛和文化革命。

在当今西方世界,特别在当今的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巴迪欧具有特殊的地位。他是坚持打着马克思主义大旗,大力弘扬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家。无疑,他已经成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左翼思想家。特别指出的,巴迪欧自己还认为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中获得了灵感,他十分崇拜毛泽东那种将行动置于理论之上的实践主义态度,他曾宣告:我就是那种毛泽东主义者。巴迪欧思想的形成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在理论上,他涉猎甚多,他将多个不同类型的思想缝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风格、思想渊源。不过总体说来,巴迪欧的思想有三个主要的来源,即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后康托尔数学集合论,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如果我们要从巴迪欧的理论中找到一个关键词,这个词非主体莫属。当然,巴迪欧的主体理论绝非让我们返回到笛卡尔式的沉思主体那里,相反,巴迪欧一直就是将革命中行动者作为主体的标准形象。作为一个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成长起来的

一代来说,在街头进行实际的政治运动,比书斋里鼓捣什么革命理论更为有用。也正因为如此,巴迪欧坚持,哲学本身不是目的,而我们去研究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用哲学去改变整个世界。可以说,1968 年的五月风暴对巴迪欧影响十分巨大,那种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的气息始终没有在巴迪欧身上淡化过,他强调,只有在革命的运动中才能找到通向未来社会的目标,而所有的理论都应该在具体的行动中来寻找。我们从巴迪欧的主体理论中可以理解出两层意思:一方面,主体并不是像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那样认为是一个匮乏,一个空无的存在;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是主体,主体和事件一样都是稀缺的,或者说,只有在事件发生之后,主体积极介入了事件之中,人们才成为主体。巴迪欧和马克思一样,坚信只有工人阶级用自己的行动,才能真正地创造历史。在巴迪欧的所有理论中,他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影响深远。巴迪欧的共产主义的概念尽管找到了巴黎公社的事件作为其论证的基底,不过,从整体上来说,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和青年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一样,是一个从哲学上来展开的共产主义观念。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意味着对异化劳动的克服,同样,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只是从他的抽象的集合论出发,将那个最终的共产主义作为大写的一。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区别在于,一是他完全没有谈到经济因素在政治革命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二是他只将革命的注意力放在了突发性的事件之上,似乎只有出乎意料的在正常秩序之外的突然事件,才能使主体成为主体并介入到其中,而在事件之前,是不可能存在主体的,当然,也不会产生有效的革命运动。不可否认,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在许多方面都保留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成分。

七

综上所述,苏东剧变后即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后的西方世界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由于在特殊的历史的条件下展开的,从而这一研究相比于20世纪的其他历史阶段来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归结起来有:其一,以政党为依托的研究转移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在20世纪其他历史阶段,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以政党为依托的研究。西方不少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这在法国表现得特别明显。法国是不能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家的地方,但在苏东剧变前,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家基本上都从属于某些党派或某些政治团体。连阿尔都塞、萨特、列斐伏尔这些人的原先都是共产党的学者,更不要说像伽罗迪这样的理论家。苏东剧变后,这种现象顷刻改变。20世纪80、90年代以后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上成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即使有的人仍在共产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中担任某种职务,但在各种探讨马克思主义场合,他们总是以超党派的独立学者的面目出现。就拿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来说,其成员不少根本没有政党的背景而是所谓的“自由派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即使其中有的仍然是法国共产党或其他政治团体的成员,但他们完全以独立的身份参加“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活动的。其二,经院式的研究转移为密切联系实际的研究。考察一下苏东剧变之前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是所谓的“经院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远离现实生活,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考据式的研究,只是关在高楼深院里啃马克思的著作。不要说那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如此,就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思想家也是这样。尽管这种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改变,但总体上看,只是在苏东剧变后才从根本上扭转。确实是在苏东剧变后,已很少再见到此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了。且不要说像“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这种本身以现实问题为指向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思想家,就是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理论家,在苏东剧变后也越来越使自己的研究面向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政治伦理转向”实际上就是向现实生活靠拢。从以政党为

依托研究转换成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强调多学术角度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研究变得脱离现实。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这些高声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越来越贴近生活。其三,单学科的孤立研究转换为跨学科的整体研究。苏东剧变前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者往往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一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取出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从而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变成了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某一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尽管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断地提出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割裂成一门门孤立的学科,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整体,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多数的研究者一直对此置若罔闻。苏东剧变后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打破了学科的界限,注重在马克思主义有机整体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偏重于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不再仅从某一学科的角度加以探讨,而是强调对现实作多学科、综合的考察。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作理论研究,也突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综合性的研究。其四,争吵不休的论战式的研究转换为求同存异共同探讨式的研究。苏东剧变前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就是一部争吵和斗争史。研究者往往为了说明自己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惜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动干戈。不要说在 20 世纪上半叶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三股思潮的“三足鼎立”,就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人本主义倾向与科学主义倾向之间的“两刃相割”,就足以说明问题。苏东剧变后,往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常见的那种分庭抗礼、明争暗斗现象少见甚至不见了,而代之以推己及人、相辅而行的局面。当然,在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之间,甚至在同一派别的各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仍然存在着分歧,但研究者不会围绕着这些分歧明火执仗地争斗。上面这些在苏东剧变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出现的新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西方世界正在沿着

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嗅觉灵敏的西方资产阶级似乎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所出现的这些新特点上预感到了什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评论说: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曾经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

在分析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仅仅看到上述这些特点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很有可能产生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实际上,在上述这些特点背后隐匿着一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倾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的日益严重的分化。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研究非常热闹,一派兴旺,但其实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各异。当然有些研究者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基本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们也在那里提出为了使马克思主义面对现实,必须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但显然这种推进并不是从整体上推倒马克思主义。但是还有些研究者,则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作“否定性”、“批判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实际上只是个批判的、否定的对象。他们已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的态度,在这一前提下进行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他们站在后现代主义等各种西方思潮的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判。当今西方的绝大多数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部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基本上属于前者。他们一方面挖掘和揭示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和妇女理论,另一方面用这些理论来分析相关现实问题。当今英美的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有些成员也属于前者。如英国的伊格尔顿,美国的奥尔曼、哈特,法国的拉比卡、戴克西埃基本上都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他们一方面不断地回击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否定和攻击,另一方面又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用他们重新阐述过的马克思主义来回答现实问题。当然,以“毛泽东主义者”自称的巴迪欧在这方面可能比这些人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除了这

些人之外,其他的许多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显然是否定多于肯定,批评多于弘扬。对“后马克思主义”我们虽然在论述中,对其“试图在作为政治与文化力量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祛魅中拯救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仍有价值的一些方面”这一点做出了肯定,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它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援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洞见,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度解构,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根本性的建构”。法兰克福学派在实现“政治伦理转向”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以后,实际上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决裂了。无论是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维尔默的政治伦理思想,还是奥菲的福利国家理论,都很难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了。至于当今英美的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有些成员,以及像鲍德里亚这样的研究者,他们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了,他们也已把注意力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重建上。必须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围绕着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往往同他们的思想中有没有后现代主义的成分,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成分的多少相关。大凡受后现代主义影响比较深的研究者,都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而凡是对后现代主义强烈抵制的学者,往往不会轻易地放弃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确实,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目前西方世界处于“此长彼消”的局面。而且随着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影响的日益扩大,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那种否定性、批判性研究的倾向也大有占上风之势。这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作者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心副主任)

Descending from The World of Thought to The World of Actuality

——Marx's Critique of Hegel's and the Young Hegelians'

Idealistic Concepts of History

Yu Wujin

Abstract:

Marx's Critique of Hegel-young Hegelians idealistic concept of history expands along with three different dimensions——thought, history and language, which puts forward to philosophers a fundamental task to philosophers to descend from The World of Thought to The World of Actuality. Of course, Marx's critique h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actual meaning at present.

Key words:

critique, thought, history, language

Comment on the Studies of the Western Marxism Philosophy

Chen Xuem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most important trends of Marxism research since the 1990s in Western world, such as eco-Marxism, feminism Marxism, post-Marxism, Frankfurt School, and others in England, America, and French. Although some people are still adhering to Marxist trend, and trying to establish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with the growing impact of postmodernism in West, negative and critical studies trend to gradually occupy the upper hand, which is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Key words:

eco-Marxism, feminism Marxism, post-Marxism, Frankfurt School

Back to the living world

——Revolutionary turning of the basic theory of Western Marxism

Sun Chengshu

Abstract:

The most improvement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estern philosophy is to propose the life-world problem, which sets up a more important area apart from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de of thinking, to measure the legality and correctness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Habermas, Lefebvre, and Heller are specialized in this area. This is the continu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revolu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whi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riticism of capital metaphysics, for the rebuilding of the one-sidedness of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textbook, and for rebuilding of the Historical the foundation of Materialist system.

Key words:

Living world, daily life, the micro revolution, social identity

Marx's Deprivation and Compensation Theory of Religion:

Heritage and Reflection from Sociology of Religion

Yu Zhejun

Abstract:

This paper devotes to interpret Marx's notion of relig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study, focusing especially on deprivation and